

# 唐、蘭風書中有關鄭氏政權瓦解的 訊息及其傳日經過

松方冬子\* 著、杉本房代\*\* 譯、劉序楓\*\*\* 校修

## 摘 要

本文的目的，係以 1683 年到 1685 年為範圍，根據唐船風說書以及荷蘭風說書，考察鄭氏政權瓦解的訊息流傳至日本的過程。不論是唐船風說書或是荷蘭風說書，都是長崎的唐通事及荷蘭通詞聽各個船員的口述，而以日文寫下的紀錄。

從中國各地甚或東南亞來日本的唐船，帶來有關鄭氏政權瓦解過程的詳細資訊。部分唐船風說書的內容，會被後來的唐船修正，各船之間為了博取長崎奉行的好感而互相競爭，像這樣的例子非常多。另外，鄭氏政權所在地東寧的相關訊息則被限制外流，所以只有從東寧出港的船隻才可能獲得東寧方面的情報。此外，唐船風說書中，有時也有以類似邸報或小報等的「迴書」消息做為訊息來源。

與此相對，荷蘭風說書的資訊則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隻所帶來。該公司為了要取信於日本，不太會修正之前船隻傳達的消息，這是該公司為了確保獲得日本幕府的信賴而採取的一貫方針。該公司因為在中國並沒有據點，所以在這段期間對臺灣發生的事情並不清楚。因此，對於鄭氏政權的瓦解過程僅傳達了簡略的訊息，有時甚至也會出現錯誤的資訊。

**關鍵字：**鄭氏政權、明清交替、唐船風說書、荷蘭風說書、唐通事、荷蘭通詞、長崎

---

\* 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特殊史料部准教授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1 年 9 月 29 日；通過刊登：2012 年 2 月 1 日。

- 一、前言
  - 二、唐船風說書之情報
  - 三、荷蘭風說書之情報
  - 四、清朝「官船」來到長崎
  - 五、結論
- 

## 一、前言

有關 1661 年<sup>1</sup> 至 1683 年間統治臺灣的鄭氏政權研究，單以日文的著作而言，<sup>2</sup> 內容就非常豐富。最近較全面的研究有林田芳雄的《鄭氏台灣史：鄭成功三代の興亡実紀》一書。<sup>3</sup> 該書主要是依據《先王實錄》、《海上見聞錄》、《閩海紀要》、《臺灣外記》等漢文史料，嘗試作實證客觀的敘述。

另外，關於鄭氏政權成立期及政權剛成立時的情況，較早期有森克己據 1661 年荷蘭人提供的資訊，再透過宇土細川家整理傳來，有關臺灣情勢的「口上書」分析；<sup>4</sup> 還有永積昭利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書，分析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清朝的交涉情形<sup>5</sup> 等研究。而同一時期，也有從荷蘭喪失臺灣的觀點，<sup>6</sup> 以及鄭氏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海上交戰的相關研究。<sup>7</sup>

---

<sup>1</sup> 本文在引用史料之外的部分，原則上使用太陽曆。

<sup>2</sup> 有關中文之研究，請參考鄭廣南，〈福建における鄭成功及び鄭氏の貿易に関する研究の現状〉，《中國研究月報》47: 6 (1993 年 6 月)，頁 32-39 之介紹。

<sup>3</sup> 林田芳雄，《鄭氏台灣史：鄭成功三代の興亡実紀》(東京：汲古書院，2003)。

<sup>4</sup> 森克己，〈国姓爺の台湾攻略とオランダ風說書〉，《日本歴史》48 (1952 年 5 月)，頁 2-11。

<sup>5</sup> 永積昭，〈鄭氏攻略をめぐる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の対清交渉(1662-1664)〉，《東洋學報》44: 2 (1961 年 9 月)，頁 24-53。

<sup>6</sup> 村上直次郎訳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東京：平凡社，1975)，第 3 冊；Frederik Coyet 著、生田滋訳注，《閉却されたるフォルモサ》(東京：岩波書店，1988)；永積洋子，〈東西交易の中継地台湾の盛衰〉，收於佐藤次高、岸本美緒編，《市場の地域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頁 326-366 等。

<sup>7</sup> 木村直樹，〈異国船紛争処理と幕藩制国家：1660 年代の東アジア海域を中心に〉，收於藤田覚編，《十七世紀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頁 11-38。

在鄭氏政權瓦解過程方面，首推曹永和的先驅研究。<sup>8</sup> 此外，尚有由荷蘭與中國關係史的觀點切入，並大量使用荷蘭語、英語、葡萄牙語等多國史料的衛思韓（John E. Wills, Jr）著作。<sup>9</sup> 至於最近，則有黑木國泰在十七世紀環中國海體系的變化與鄭氏政權關係的論文<sup>10</sup> 中提及。前述林田芳雄、曹永和及衛思韓等人的著作，各有其觀點，且重點不同，其中也有相互矛盾之處，但本文不打算評論其優劣，亦不另外介紹新的史實。

本文主要以 1683 年到 1685 年間之唐船風說書、荷蘭風說書的內容為研究對象，嘗試探討鄭氏政權瓦解過程的訊息如何流傳至日本。

有關唐船風說書的研究，早期為浦廉一，<sup>11</sup> 近年則有松浦章的著作。<sup>12</sup>

浦廉一的研究主要針對收錄唐船風說書的《華夷變態》內容進行解說而作的考察。《華夷變態》最初係由江戶幕府時代儒官林春勝（鷲峰）彙編 1644-1674 年間所聽聞的三藩之亂情報，其後由春勝之子信篤（鳳岡）再編纂至 1720 年。主要內容係描述 1644-1658 年南明政權期間向「日本乞師」之事，其後歷經短暫空白，之後為 1674 年吳三桂與鄭經的檄文，以及同年（1674 年）以後流傳所謂的「唐船風說書」（即以「五番廣東船之唐人共申口」等作為標題，主要是根據唐通事所聽聞的調查紀錄）。

浦廉一認為唐船風說書起源於「為了我國（日本）政權之運用，有必要取得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內外情勢訊息」，<sup>13</sup> 但是他也認為，唐船風說書的起源與荷蘭風說書相同，均與當時禁止基督教的背景有關，並指出另一個目的是隨時代以降，期待其能防止唐船的走私貿易。<sup>14</sup> 另外，浦廉一也主張唐船風說書的作成，

<sup>8</sup> 曹永和，〈環シナ海域交流史における台湾と日本〉，收於箭内健次編，《鎖国日本と国際交流》（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上冊，頁 611-639。

<sup>9</sup> John E. Wills,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16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sup>10</sup> 黑木國泰，〈17 世紀・18 世紀環シナ海地域システムの変容と鄭氏台湾：漂流・漂着船関係史料を中心に〉，《宮崎女子短期大学紀要》31（2005 年 3 月），頁 57-74。黑木氏認為，鄭氏投降的訊息，透過唐船陸續且確實地傳到了長崎。但是鄭氏正式投降之事，日本最早知道的是薩摩藩，應是透過赴琉球的清朝冠船所得知。

<sup>11</sup> 浦廉一，〈華夷變態解題：唐船風說書の研究〉，收於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東京：東洋文庫，1958），上冊，頁 1-78。

<sup>12</sup> 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說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出版，2009）。

<sup>13</sup> 浦廉一，〈華夷變態解題：唐船風說書の研究〉，頁 24。

<sup>14</sup> 浦廉一，〈華夷變態解題：唐船風說書の研究〉，頁 24-27。

主要是因為在《唐通事會所日錄》<sup>15</sup> 中曾提到「去聽取傳聞」等文字，故風說書應該是「先從唐人那邊聽到傳聞，再由唐通事以日本語寫成」。<sup>16</sup> 就本文有關的部分而言，在遷界令實施期間，仍有唐船偷渡至日本，加上清朝政府為了確保洋銅（日本銅）來源的必要性，對於前往日本的貿易船並未嚴格禁止。<sup>17</sup>

松浦章的研究則以《華夷變態》未收的唐船風說書為重點，主要描述三藩之亂以及 1688 年湖北省武昌兵變之訊息流傳至日本的過程，但對於鄭氏政權瓦解過程則完全未提。

至於荷蘭風說書，則在 1970 年代時出版了史料集《和蘭風說書集成》，<sup>18</sup> 且迄今已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sup>19</sup> 相較於荷蘭風說書，處理唐船風說書的研究相當少，因此無法得知更詳細的情形。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唐船風說書僅有 1674 年至 1724 年留下較完整資料，期間較短；第二個理由是缺乏中國方面相關證據資料的研究介紹。<sup>20</sup>

唐船風說書與荷蘭風說書的共通之處，在於風說書的內容是由唐通事及荷蘭通詞分別以日本語記錄下唐人或荷蘭人在長崎的談話。在荷蘭風說書中，商館長傳達的訊息多來自在巴達維亞（今印尼的雅加達）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督寄給商館長的信件，從中也可了解到東印度公司內部的意圖及背景。但是唐船風說書的內容就較難從其他史料中取得驗證。然由於唐船風說書的內容包括三藩之亂以及鄭氏政權瓦解前後的動向，並對遷界令實施期間中國沿岸的情況有生動的描述，

<sup>15</sup>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唐通事會所日錄》（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5-1968）。

<sup>16</sup> 浦廉一，〈華夷變態解題：唐船風說書の研究〉，頁 37。但是「由唐人提出的書面文書也不是完全沒有」。參見浦廉一，〈華夷變態解題：唐船風說書の研究〉，頁 38。

<sup>17</sup> 浦廉一，〈華夷變態解題：唐船風說書の研究〉，頁 5-6。

<sup>18</sup> 此史料集由法政蘭學研究会編，《和蘭風說書集成》（東京：日蘭學會，1976、1979），上、下卷；與日蘭學會法政蘭學研究会編，《和蘭風說書集成》（東京：吉川弘文館，1977、1979），上、下卷，二者頁數及內容完全相同。以下簡稱《集成》。

<sup>19</sup> 有關研究史整理及最新研究成果，請參考：松方冬子，《オランダ風說書と近世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松方冬子，《オランダ風說書：「鎖國」日本に語られた「世界」》（東京：中央公論社，2010）。

<sup>20</sup> 2009 年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之孫文，以〈「華夷變態」研究〉為題，完成博士論文。主要是以浦廉一的研究為基礎，從文獻史料的角度，對「華夷變態」風說書的成立背景進行深入探討，可說是目前較詳細的研究成果，可惜並未與中國史料作詳細比對。又此博士論文最近已整理出版，參考孫文，《唐船風說：文獻與歷史——《華夷變態》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包含唐船船長們的見聞或是他們聽到了什麼樣的傳聞等，可說是非常珍貴的史料。

在具體研究風說書的內容之前，筆者想要對此時期的歷史先作簡要的說明。三藩之亂始於 1678 年，此時清朝跟鄭氏的戰爭也進入最後階段，激烈的戰鬥持續不斷。1679 年福建總督姚啟聖呼籲鄭氏官兵投降，並大力宣傳願意受降者將可享有特別待遇。另外，清朝也已構想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聯手攻擊在廈門、金門的鄭氏勢力。<sup>21</sup> 1675 年清朝開始與東印度公司互換使節，東印度公司並自 1677 年開始派遣貿易船到福州，1678 年秋天起 Martinus Caesar 常駐福州。1679 年春天，清朝康熙皇帝命令東印度公司海軍援助的敕書送抵福州，但錯過往巴達維亞的船隻。而 4 月 8 日勉強出港的荷蘭船，也因為遭遇鄭氏船圍捕，又折返福州。故勅書是由福州的使節（劉仔與林奇逢）至同年 12 月才送抵巴達維亞。荷蘭東印度總督<sup>22</sup> 收到之後也沒有立刻回應，等到隔年（1680 年）5 月始回覆表示，如需軍援的話就必須先支付費用，在同意此條件的前提之下，才可能於 1680 年末派船援助。<sup>23</sup> 結果，清朝康熙皇帝決定不等荷蘭援助，在 1679 年 12 月即自行對鄭氏軍隊展開攻擊，1680 年 3 月鄭經（錦舍）棄守廈門，<sup>24</sup> 退守臺灣。

廣東平南王尚之信雖歸順滿清，但在 1680 年被康熙皇帝賜死；其後歸順的耿精忠則被召往北京，與康親王傑書一同前往。此時日本正值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的時期。1681 年鄭經歿後，後繼者的紛爭不斷，最後由次子鄭克塽繼任。而在雲南的吳三桂之孫吳世璠則在清軍的追擊之下自殺，三藩之亂終告結束，清朝也解除部分的遷界令。1682 年，耿精忠在北京被處以磔刑，英國東印度公司雖在 1670 年代與臺灣的鄭氏政權有貿易往來，但 1682 年也開始派遣船隻到中國大陸沿岸。<sup>25</sup> 1683 年清朝將軍施琅占領澎湖，隨後鄭克塽決定投降，施琅進入臺灣，將鄭氏家族、明魯王朱以海之子朱弘桓等宗室及其軍民遷往內地。鄭克塽被移送

<sup>21</sup> 林田芳雄，《鄭氏台灣史：鄭成功三代之興亡實紀》，頁 89。

<sup>22</sup> 1678 年 1 月 4 日，總督 Joan Maetsuycker 在任中去世，繼任的 Rijckloff van Goens 於 1680 年 10 月 29 日依願免職；後任總督 Cornelis Speelman 也於 1684 年 1 月 11 日在任中去世，故由 Johannes Camphuys 繼任。

<sup>23</sup> John E. Wills,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1681*, pp. 145-149, 166-167, 172-174, 179-183.

<sup>24</sup> 1663 年清朝及荷蘭聯軍成功奪取廈門，1673 年鄭經應靖南王耿精忠之請，奪回廈門。

<sup>25</sup>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 354。

北京，隸屬正黃旗漢軍。1684年清朝正式解除遷界令，頒布展海令。此外，康熙亦至蘇州南巡（康熙第一次南巡）。<sup>26</sup>

## 二、唐船風說書之情報

這段期間鄭氏政權的動態，唐船風說書有詳細的記載。唐船風說書的特徵在於有時會將前船所提供之資訊再做修正，茲舉例如下。

1683年8月7日唐通事提出的「九番東寧船之唐人共申口」<sup>27</sup>內容相當長。先述及在當時清朝內部主張與鄭氏和平交涉的姚啟聖（在《華夷變態》一書中多被寫為姚啟勝）與主戰派的施琅之間的對立，最後在與鄭氏交涉過程中，由於鄭氏的輕忽，結果被清朝突擊成功和澎湖島戰事的情形，之後是鄭經海軍退守，但陸軍仍殘留在澎湖，故清軍並未登陸等描述，接著有如下之記載：

有關臺灣的情形，如先前入港的四號及八號，二艘由臺灣出港的船所述，大致無誤。……八號船之前是暹羅〔泰國舊稱〕的船隻，因此對臺灣及澎湖的狀況應該不是很清楚，尤其是有關澎湖被滿清奪取之傳言，他們應該是在不了解的情況下所述，澎湖被奪取並非事實。<sup>28</sup>

由於鄭氏軍隊軍力充沛，並不擔心清朝的攻擊，且眾將士團結一致，自暹羅購買兵糧。另外，預定由臺灣出發至日本的5艘船當中，有1艘為鄭克塽擁有的船隻，所以臺灣情勢應屬安穩，鄭氏與滿清的關係看來也還算和睦。

另外，「八號東寧船」在7天前，也就是7月底提出風說書。根據其報告，這艘船是在5月14日由暹羅出發，6月15日抵達臺灣，將米卸下並裝滿砂糖之後，7月22日向長崎出發。

<sup>26</sup> 以上的記述主要參考松丸道雄、池田温、斯波義信、神田信夫、濱下武志編，《世界歷史大系：中國史4——明、清》（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頁338-343。

<sup>27</sup> 在長崎，依照入港的順序，將當年入港的唐船稱為1號船、2號船等。

<sup>28</sup> 原文省略，以下同。參考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371-372。在日本發表的日文論著中，對近世古文書通常不翻譯成現代語。本稿因投稿臺灣的期刊，故附上筆者現代語譯。另外，筆者翻譯及補充追加之處均以〔 〕表示。

此外，如同九號船之前所說的，十號船也於 8 月 13 日抵達，並傳達以下的訊息：

先前由臺灣出發且已抵達的九號船所傳達的臺灣相關訊息，並無錯誤。但是九號船是在這個月 2 日出港，在那之前，臺灣領有的澎湖島……，尚未有清軍登陸……但是我們在這個月 5 日由臺灣出港之時……已有大量的滿清軍隊進入澎湖的港口，眾將士也正準備登陸作戰。<sup>29</sup>

也就是說，雖然九號船的情報正確，但九號船出港後，又傳來清軍已經開始登陸澎湖島的最新消息。

之後由臺灣來的十二號船之風說書，內容詳細描述寧靖王朱術桂<sup>30</sup>自殺的消息，開頭的部分介紹如下：

我們的船在這個月 1 日由臺灣出港，前往日本的途中遭遇逆風，導致抵達長崎的時間有所延誤。在我們之後的是 2 日出發的九號船，以及 5 日出發的十號船，這兩艘船傳達的消息大致無誤。但是有關明朝末孫寧靖王殉國的情形，……由於這兩艘船的停泊地與東寧府都有一段距離，船長或水手都只待在船隻的附近，應該不會知道東寧城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城內發生的事情不論好壞，均嚴禁流傳至其他地方，所以這兩艘船應該不可能知道此事。我們的船隻停泊在東寧府城附近，而同船者有一位當時在城內的王員官，由於他住在寧靖王府附近，目擊到詳細的情況。此外，澎湖島將軍劉國賢〔軒〕返回東寧的情況，以及鄭克塽以必死的決心準備抗爭的狀況，那兩艘船應該都不知道才是。<sup>31</sup>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有關於朱術桂之死，在澎湖島被占領之後，朱術桂就決定結束自己的性命，並命令夫人們一起殉國，在確認她們死亡之後，其便於關帝廟自縊，之後並受到人民祭拜。而其他有關朱術桂是魯王朱以海兄長的事情（這並非事實）等等，該內容中亦有非常詳盡的敘述。

<sup>29</sup>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 376。

<sup>30</sup> 1618 年生，為明宗室，與其兄長陽王朱術雅均擁立南明政權的福王朱由崧，鄭成功渡臺後也隨之來臺。

<sup>31</sup>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 382。

而鄭氏投降的第一手報導，是在隔年（1684年）8月27日唐通事提出的「一番廣南船之唐人共申口」中提到。該船本來是在巴達維亞的中國人所擁有，並在巴達維亞及日本間來回。但是因為前年天候惡劣，因此船隻停泊在現在越南南部的廣南，所以被稱為「廣南船」。由在臺灣的施琅派遣至廣南的船隻得知鄭氏投降的情報，其後又有如下的敘述：

臺灣的鄭克塽由於無法與清朝對抗，考量情勢之後決定投降。在澎湖的清朝將領施琅去年8月3日進入東寧受降。鄭克塽與官員依照清朝習俗剃髮，並與施琅前往福州，隨後鄭克塽即赴北京，康熙帝賜與「順昌王」之王號，鄭氏大將軍劉國賢〔軒〕也被賜給「十三省總兵」之官位。<sup>32</sup>

同一天，「二號東京船」也在東京（今越南北部）與一號廣南船聽到同樣的消息。8月27日「三番廣東船之唐人共申口」也證實了同樣的內容，但是與一號船及二號船不同之處在於，鄭克塽並未前去北京，而是留在福州。其理由是鄭克塽年紀尚輕且在臺灣長大之故，因為不會說「南京口」（南京官話），<sup>33</sup> 所以臨時決定先在福州練習些許「南京口」之後才赴北京謁見。

雖然也是在同一天8月27日，但是「八番廈門船之唐人共申口」<sup>34</sup> 則有相當詳盡的報告。主要是施琅從臺灣回師廈門，而此船亦是從廈門出港。施琅不僅對廣南及東京傳達了鄭氏投降的訊息，<sup>35</sup> 也打算半公開的對日本發布同樣的訊息。這次唐船風說書的冒頭部分就提及：「我們的船是叫施琅的人，回到漳州之廈門後，由廈門出發的船。」<sup>36</sup>

由這史料來看，施琅好像是委託前往日本的商人傳達自己的狀況。類似的情形在下面的例子也可看到：

<sup>32</sup>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416。

<sup>33</sup> 應是指「官話」，參考木津祐子，〈唐通事の「官話」受容：もう一つの「訓読」〉，收於中村春作，市來津由彦、田尻祐一郎、前田勉編，《続「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東京：勉誠出版，2010），頁260-291。

<sup>34</sup>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425-429。

<sup>35</sup>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416，「一番廣南船之唐人共申口」；頁418，「三番東京船之唐人共申口」。

<sup>36</sup>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425。

一般而言清國內有所謂的「總兵官」，而〔劉國賢被任命的〕天津衛總兵官是天下總兵之首，為非常重要的職位。但是之前一號船及二號船在風說書中傳達的「十三省總兵官」的訊息是錯誤的。……此外，〔鄭克塽接受〕封位的救命雖還沒發出，但是所有的消息均傳是賜為順清王這個王號，前船所說是順昌王，應是文字有誤。<sup>37</sup>

其他類似這樣修正之前風說書的例子所在多有，此處再舉一個例子。1685年4月14日的「七番福州船唐人共申口」<sup>38</sup>中有以下的內容，大意如下。

康熙皇帝去年赴南京蘇州巡幸之時，受到北京的皇太后之召而提早回京。今年春天則有前往西湖出巡的救命，入蘇州城時，住宿於「御普代之住宅」（世臣的宅邸），這是根據最近抵達長崎之船所傳出的消息。但是，之前的船隻應該不知道詳細情形，我們根據從蘇州送往福州的「迴書」得知，正確的情報應該是在虎丘寺住了一晚。也就是說，去年鄭克塽投降後赴北京的途中，在南京的揚州遇上正在南巡中的康熙，隨即在當地晉見了康熙。之後在北京受封為順清王，鄭克塽的隨從也分別被賜與官位。不過這個在揚州晉見康熙的訊息，之前的船隻並不知情，因此未提及拜謁之事，我們是根據從揚州傳來的「迴書」得知詳細的情形。

「七番福州船唐人共申口」中強調自己的訊息比先前船隻的報告更加正確。但是「最近長崎入港的船隻」，到底是指哪一艘船呢？有關康熙帝南巡的風說書，在「一番福州船之唐人共申口」（1685年3月11日）或「二番南京船之唐人共申口」（3月12日）中有提到。由於唐通事應該沒有將風說書拿給唐船的船長看，即使有，因是以日語書寫之故，船長也看不懂。所以唐船的船長是從唐通事那邊聽到了前船的敘述後，或再添加，或再作修正，正因如此，就有可能產生誤解。之後又有三號船到六號船共4艘船進入長崎港，因為全部皆來自福州，所以傳達的資訊都不夠詳盡。這一年由於福州、廣東的遷界令已解除，而浙江、南京還未解除，以致渡日的福州船比較多，南京船比較少。

值得注意的是由蘇州或揚州送至福州的「迴書」，唐船船長認為上面所寫的內容足以採信。而這裡所說的「迴書」，應該是當時流傳的「邸報」或是「小報」之

<sup>37</sup>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426。

<sup>38</sup>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459。

類的報紙訊息。<sup>39</sup> 根據岸本美緒的研究，明朝末年由北京傳往江南的傳媒不只有邸報，還有傳達軍事命令用的「塘報」，和民間消息的小報，以及官方發布的告示「大報」等等。塘報的資訊主要是送給特定官方機構，這種內容並非是口耳相傳的小道消息，而是印刷成刊並廣為流傳。<sup>40</sup> 如果由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除了具有嚴密意味的邸報之外，以印刷形式且能將皇帝或是官員動態傳達至遠方的報刊媒體也有好幾種。

### 三、荷蘭風說書之情報

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在 1684 年 7 月 3 日給日本商館長的書信中，命其將清朝占領臺灣（總督認為）的消息傳給長崎奉行。該信中也記載了總督對於此情報可能帶給日本影響的想法，以下引用部分相關內容：

這封書翰與 1683 年 7 月 1 日到今年 6 月 16 日止的最新情報備忘錄一起送到日本。為了您，也為了可從中將摘錄的新訊息按照慣例告知通詞們。有關給〔長崎〕奉行或透過他報告給將軍及老中（譯注：幕府閣老）的訊息，或是必須要通知的訊息，請他們〔通詞〕跟您加以判斷。福爾摩沙島被占領將使江戶的幕府產生很大的變化，也就是下一步〔征服的〕將要輪到他們〔日本〕，〔如果是這樣的話，〕日本人將會很恐慌。因為現在韃靼人他們的敵人已被消滅，在國內國外均無顧慮的情形下，下一步要征服日本的可能性也增高。<sup>41</sup>

<sup>39</sup> 關於此點，是得到劉序楓氏的指教。有關邸報的日本語研究，可參考小糸忠吾，〈中国・西方間の交流と邸報：十八世紀末までの進展を探る〉，《ソフィア》27: 3（1978 年 11 月），頁 236-250；足立利雄、三沢玲爾，〈中国報紙（新聞）史研究（Ⅱ）：邸報および小報について〉，《関西大学社会学部紀要》15: 1（1983 年 11 月），頁 187-216；李鍊，〈最古の新聞、中国「邸報」をめぐって〉，《総合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25: 4（1988 年 10 月），頁 78-85 等文。

<sup>40</sup> 岸本美緒，〈崇禎 17 年の江南社会と北京情報〉，收於「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編集委員会編，《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和田博徳教授古稀記念》（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 347-364。

<sup>41</sup> 荷蘭國立中央文書館（Nationaal Archief）所藏日本商館文書（以下簡稱「NFJ」）315 號，1684 年 7 月 3 日荷蘭東印度總督 Johannes Camphuys 致日本商館長 Ranst, Constantin, de Jonge 書信。此外，以下的荷蘭語譯文中，筆者補充追加的部分以〔 〕表示。

荷蘭風說書的資訊，由這封信可得知，是從巴達維亞送至日本的「最新情報備忘錄」（巴達維亞的總督收集的新聞）。<sup>42</sup> 清朝是否會征服日本的疑慮，在當時幕府內部是否有討論，很遺憾無法得知。雖然有人說由於鄭氏政權的瓦解，而使得東亞海域的政治情況變得安定，<sup>43</sup> 此說法雖有說服力，但缺乏具體的史料證據。

日本商館長在 1684 年 8 月 25 日的公務日誌裡有提到，收到這封信後曾將鄭氏政權瓦解的訊息轉達給日本人。據此日誌，荷蘭人所傳達給日本的風說書之 9 項訊息中，第 3 項的訊息與此相關。內容如下：

Pescadores（澎湖）諸島被韃靼人征服，之後整個福爾摩沙島也被武力鎮壓。<sup>44</sup>

跟總督的書信相同的是，兩者均提到臺灣被武力鎮壓之事，但是非常簡略。可知鄭氏政權瓦解的訊息，不過是在同年荷蘭人所提供眾多訊息中的一項而已。而其中第 1 項是蘇門達臘島當地發生紛爭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艦隊之事。第 2 項是由於前任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的死亡，總督交接之事。對荷蘭人來說，這個訊息比鄭氏的動向來得更重要。

由荷蘭人處聽來的訊息所編輯的 1684 年 8 月 24 日之「風說書」中，第 2 條有以下記載。又，這一年的荷蘭風說書僅有一件：

這些話是到巴達維亞的廣東貿易商人所說的，從韃靼派遣來的軍船駛往臺灣附近的澎湖，即將攻打臺灣，臺灣的大將軍開城投降並逃往柬埔寨。<sup>45</sup>

這個記載強調的是在廣東經商的唐人來到巴達維亞所透露出來的訊息。而鄭克塽逃到柬埔寨的傳聞，在其他史料則未曾出現。與商館長的日記進行比對，追加了鄭克塽逃到柬埔寨，和在巴達維亞聽到的傳聞等，這部分是當初荷蘭人不打算提到的，有可能是長崎的荷蘭通詞在聽取時所追加。

<sup>42</sup> 詳細內容請參考：松方冬子，《オランダ風說書と近世日本》，第 3 章。

<sup>43</sup> 例如羽田正，《東インド会社とアジアの海》（東京：講談社，2007），頁 342-343。

<sup>44</sup> NFJ97，商館長日記 1684 年 8 月 25 日條。

<sup>45</sup> 《集成》，上卷，53 號，頁 115。

荷蘭風說書中有關鄭氏政權瓦解的記載，僅有上述部分，比唐船風說書少得多。但之後商館長可能從日本通詞處得到唐船風說書所提供的詳細訊息。5日後的商館長日記有如下記載：

通詞吉左衛門告訴我們以下的內容。在臺灣的中國人不是因為暴力，而是自願的將福爾摩沙島交給韃靼人，錦舍之子跟多數的人員全體依照韃靼人的風俗一同剃髮後，率領船隻自願前往福州，轉赴北京的宮廷，在當地〔清朝的〕皇帝告知將賜予比照 dayro 的高官位，以表示對他〔鄭克塽〕的好意。但是這個〔職位〕到底擁有多少權力，以及是否已真的賜予，仍還無法得知。<sup>46</sup>

在當時的荷蘭商館長的日記中，通常「dayro（內裏？）」<sup>47</sup>是在稱呼日本天皇時才能使用的用語，因此這個字眼有一點奇怪，有可能是通詞想對荷蘭人舉例，強調鄭克塽被賜予的官位有多高而用之語。

結論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對於臺灣的詳細情況並不清楚，反而是從日本人方面取得相關的訊息。

#### 四、清朝「官船」來到長崎

再回到《華夷變態》的記載。先前提到 1685 年來到長崎的七號福州船和之後的八號南京船，傳達了 4 月 21 日南京、浙江、山東各省已有一部分解除遷界令的消息。7 月 29 日十九號廈門船的風說書中傳達了南京、浙江的遷界令已撤除的訊息，之後唐船陸續到港，《華夷變態》記載了至八十五號寧波船為止所有的風說書，<sup>48</sup> 如果和 1684 年僅有 24 艘船的記載相比的話，竟然成長了 3 倍以上。

其中較重要的條目是 1685 年 8 月 25 日唐通事提出的「申上覺」和「覺」<sup>49</sup> 的

<sup>46</sup> NFJ97，商館長日記 1684 年 8 月 31 日條。

<sup>47</sup> 「內裏（だいら）」即「天皇」之意。原指天皇居住的處所，亦指天皇本身。當時荷蘭人以「內裏」稱呼天皇。

<sup>48</sup> 根據研究，這一年共有 73 艘船來航。山脇悌二郎，《近世日中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頁 23-37。

<sup>49</sup>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 492-496。

史料，是記錄在「五十一番船福州船之唐人共申口」之後。<sup>50</sup>

同文書是廈門來的文官梁爾壽，以及福州來的武官江君開等人，為了監督由廈門、福州來的 13 艘「官船」，而同船至長崎，唐通事為此詢問船長，而寫成的報告書。回答的內容大意如下。

康熙皇帝召見鄭克塽，並就遷界令實施後為何臺灣並未出現兵糧短缺的現象提出疑問。鄭克塽回答，臺灣因田地廣闊而食糧充裕，若有不足，派遣船隻赴暹羅或柬埔寨，就有可能從當地買到便宜的稻米，<sup>51</sup> 所需資金則來自赴日本或其他地方販賣鹿皮與白砂糖後所獲得的利銀。

於是康熙皇帝也採取相同做法，命令福州總督王國安及廈門的靖海侯施琅，以臺灣特產充當臺灣駐軍的糧餉，由福州派遣 3 艘以及廈門派遣 10 艘官方貿易船，運載臺灣產的鹿皮及砂糖至長崎。

而官員一同搭乘的理由，是顧慮船長私自牟利，擔心回國之後可能發生帳務不合的情形，另也擔心船上的水手不習慣去日本，在對日本不熟悉的情況之下恐有失禮的情況發生，有損清朝政府聲譽，而作之考量。雖說是官船，但是船上僅攜帶少許的武器。因為清朝的統治穩定，誰都可以前往日本，所以赴日船隻逐漸增加。

在中國，皇帝採世襲制，但諸侯只有位階世襲，並沒有固定領地，依敕命約 3 年或 5 年會改封。文官、武官不論地位多高，若其子嗣沒有才學或武勇的話，也不能世襲位階，最終也是庶民。因此，這一次來的兩位官員，雖然官名很長，但也只是虛名，並無實權。而那位文官，類似代理臺灣事務的官職。<sup>52</sup> 比較特別的是武官江君開，之前是商船船長，已經來過日本 6 次，因為具備些許武勇的氣質，所以被任命為「權宜之都督」，但也僅只是官銜而不具實權。

<sup>50</sup> 最近彭浩，〈近世日本の唐人処罰：「日本之刑罰」の適用をめぐって〉，《論集きんせい》30（2008 年 5 月），頁 1-14 也注意到這一件史料。彭浩解釋是因為日本幕府拒絕承認中國人的「治外法權」的態度；本稿則認為關鍵應是在於清朝的官員來到日本。

<sup>51</sup> 鄭氏跟清朝的戰爭時期，尤其是鄭氏方面兵糧的調度問題，實際上是派船隻至暹羅或柬埔寨購買，這部分可從之前的唐船風說書得知。可參考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 356、371、375 等。

<sup>52</sup> 文官梁爾壽的正式官名為「奉令臺灣府督捕海防廳」，參考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 496。

根據同一天其他的「覺」中所記載，江君開的官名為「奉令督理與販洋船左都督」，而所謂的「奉令」是表示受福州總督王國安及廈門靖海侯施琅派遣的意思，如果由康熙帝所派遣的話，會再加上「欽差」這個字眼。

對此，長崎奉行派遣檢使透過唐通事轉達日方的回應。梁、江兩位官員也透過唐通事向奉行提出了「兩官人え以檢使帰帆之儀申渡候節返答並檢使へ挨拶仕候覺」。<sup>53</sup> 根據此文內容，梁、江兩位官員從奉行那邊得到儘早回國的命令，並且奉命轉達以後具有「官職之位」者不得再來到日本。梁、江兩位官員回覆，回國後，即向王國安及施琅轉達該命令，並允諾不再派遣具有「官職之位」者來到日本。此外，由於他們兩人也已判斷長崎奉行可能不歡迎他們，所以他們也特別強調此次來訪並非出於自身意願，而只是奉王國安與施琅之命不得不來，藉此推卸責任。

由於長崎奉行不斷詢問梁、江兩位官員是否攜帶官方文書，他們兩人回答「外国へ書通之儀者、勅許無之候而は難候」，亦即若無皇帝的勅許，無法與外國進行文書往來，故福州跟廈門的官吏放棄攜帶文書的念頭。

始終不變的是，長崎奉行（恐怕江戶幕府也是）詢問他們為何會有稱為「官船」的船隻來日本。另外，亦可得知，完全沒有預料到會被詢問這些問題的中國方面，也刻意將「官船」的「官」字色彩淡化，以企圖規避。

1684年施琅派遣船隻由廈門來到長崎。曹永和認為施琅的動作是以鄭芝龍第二為目標。<sup>54</sup> 曹氏主張，展海令發布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遏止施琅企圖壯大為特權商人的計畫。關於這部分，筆者無法深入詳細的探討，曹氏的主張應是妥當。因為鄭氏政權瓦解後，清朝認為已經失去維持遷界令的理由，此外，像施琅這樣將鄭氏政權逼至瓦解的人（施琅之前也是鄭氏的部屬，和鄭氏同樣具備軍人與商人的身分）之中，對於與日本貿易的意願也相當強烈，而這種強烈意願一旦爆發的話，清朝政府要如何對應，這應是清政府必須面對的新課題。<sup>55</sup>

<sup>53</sup> 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上冊，頁498-501。

<sup>54</sup> 曹永和，〈環シナ海域交流史における台湾と日本〉，頁634-636，但可惜的是曹文並未加註。

<sup>55</sup> 施琅為人傲慢且自負，曾受到北京朝廷之譴責，在《華夷變態》上冊中有詳細記載。但是可信度有多高，筆者無法判斷。

在這種變動的情勢下，梁、江兩位「官員」由中國出發時，判斷以「官」方名義比較有利，所以採用此種方式，但日本反應卻讓人出乎意料。幕府為何有此反彈，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如荷蘭總督所判斷，認為幕府擔心最壞的情況就是清朝可能帶來要求日本歸順的文書。

德川家康時代，幕府雖然努力尋求向明朝進貢，但是結果並未成功。而第 5 代德川綱吉的時代，由於國家安定，認為沒有必要進行朝貢或維持國家間關係。在長崎與唐人進行的貿易，只是商人間的交易，無需靠「官」方背景來維持，遂成為主要的方針。由於幕府不歡迎「官船」來港，所以之後便再也沒有「官船」來到長崎。

此後的 30 年，1715 年幕府發布正德新例（海舶互市新例），這是以長崎的唐通事名義簽發的「信牌」來管理渡航的唐船。康熙帝看到以漢文撰寫的新例文面及信牌實物之後，認為唐船接受這樣的信牌，並不違反「國禮」，而予以默認，這正是提出正德新例之新井白石的意圖。像兩國這樣的互動，岩井茂樹稱之為「沉默外交」。<sup>56</sup> 這個 1685 年的交涉，應該算是先驅。

另外，「申上覺」中對於中國國制的相關說明也值得注意。說明的方式採用當時日本人能理解的「領地」、「國替」等詞彙。在當時日本漢學尚未普及的時代，長崎也還沒出現「封建」或是「郡縣」等名詞。在新的體制之下，兩國間相互理解及和平共存的道路才正要展開。

## 五、結論

最後，試將唐船風說書及荷蘭風說書作一比較。根據第二節的敘述，基本上唐船風說書中，雖然認為前船的報告正確，但是經常會增加或訂正之前的訊息。由於唐船各屬不同的企業體，為了討長崎奉行的歡心，便競相增加各種新的資訊或修訂之前的訊息。另外，雖然本文並未深入探討，但仍可發現像南京船與福州船會因地緣不同而產生競爭關係。如前述，同樣是從臺灣來的船，由於鄭氏政權

<sup>56</sup> 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收於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7），頁 354-390。

末期對資訊的管制，使得東寧府近郊與鄉下間的情報產生差距。

荷蘭風說書則是在前船傳達的訊息是正確的前提下，再由後到的船隻提供新的訊息，不太可能有修正前船訊息的情況發生。主要原因是荷蘭船全部屬於同一東印度公司，加上公司的職員為取信於日本人，均會細心注意避免前後的訊息產生矛盾。<sup>57</sup> 若是下一艘船沒有來，但又提出新的資訊的話，會使日本人懷疑商館長是否故意隱瞞情報。<sup>58</sup> 此外，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總督有時候會對該提或不該提的的訊息下達指令。公司認為應該要提供的訊息，大部分是競爭對手如葡萄牙人、法國人、唐船等對日本不利的計畫，而使他們在日本的立場轉為負面。<sup>59</sup>

在唐船風說書方面，儘管彼此存在差異，但不管是鄭氏船或是由中國大陸來的唐船，因為提供中國各方面的詳細資訊而令人注目。荷蘭風說書的優點，包含了美洲大陸或歐洲、西亞、印度等世界各地資訊，但不僅個別的資訊不夠詳盡，有些連報導事件相關的人名都沒有記述。與此相比，唐船風說書則提供了詳細的地名或人名。不僅包含沿岸、出航地的訊息，連北京方面發布的消息也都廣泛收集，故值得注目。此外，有時臺灣船會傳達中國大陸的事，而中國大陸船也會傳達臺灣的事情。

就本文所討論的時期而言，唐船風說書比荷蘭風說書詳盡得多。加上，唐船風說書中人名、地名眾多，且均附上漢字，對日本人而言，所提供的訊息量遠超過荷蘭風說書。

以往筆者認為荷蘭風說書提供的是世界情勢的消息，唐船風說書僅提供出航地附近的相關消息，但是在本文撰寫過程中，筆者發現，至少在此時期對有關中國的消息就必須有所修正。唐船風說書不僅記載沿岸、出航地、北京發布的通告等訊息，有時候臺灣的船隻會傳達中國大陸的資訊，而大陸船隻也會傳達臺灣的訊息。關於這一點，就必須要考慮到明末清初江南地區資訊的豐富性。而荷蘭風

<sup>57</sup> 例如 1645 年 11 月 29 日商館長 Overtwater, Pieter Anthonijsz 之後繼任的 Zum, Reijnier van't 收到的訓令書。參考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オランダ商館長日記》（東京：東京大学，2001），訳文編之 9，附錄 4，頁 253、255。

<sup>58</sup> 例如松方冬子，《オランダ風說書と近世日本》，頁 85、89-91。

<sup>59</sup> 最典型的例子，可參考松方冬子，《オランダ風說書と近世日本》，頁 55 引用史料。

說書中有時會對葡萄牙人干擾荷蘭人和中國的貿易等事記載較詳盡的情形，<sup>60</sup> 惟這應屬例外。

如前所述，由於唐船風說書會對之前提供的訊息再作修正，雖是個別零散的情報，但若整體來看的話，可能窺出某種事情的全貌。例如以清朝對鄭氏的對策而言，是以姚啟聖與施琅的對立為中心來看；此外，在鄭氏政權內部，則特別著重劉國賢（軒）的動向。這點有可能是受到唐通事之整理（雖不至於說是操作）所致。

唐船風說書中，「大清」、「勅書」等用語，主要是基於承認清朝是中國統一政權的立場而寫；相對的，荷蘭人則一直稱滿州人為韃靼人（Tartar），<sup>61</sup> 二者有明顯的差異。若從整體來看，唐船風說書所描述的「故事」，可感覺出與鄭氏產生某種共鳴。鄭氏不論在貿易或是軍事方面，與清朝戰鬥到底，到最後且光明磊落的面對，均足以讓自詡為明移民子孫的長崎唐通事產生共鳴。

有關唐船風說書的制度與起源，還需要有更深入的研究，筆者現在的想法是，如能仔細思考《華夷變態》的成立經緯及閱讀其所收的史料，唐船風說書的主要目的，就是如「華夷變態」一語所示，是描述以明清交替為主的中國情勢；其次的目的就是揭示禁止基督教，但這似乎有點牽強。而荷蘭風說書則是基於要詆毀以宣揚基督教為目的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法國人，同時也傳達了他們的動靜。此外，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具備了僅傳達葡萄牙或法國等本國的情勢的體系。然與此相反的是，唐人對於基督教徒幾乎隻字未提，且在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初這段期間，他們也毫無向日本人誹謗葡萄牙人的理由。唐人的情報訊息網大致侷限於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沿岸。由此看來，幕府對於唐船風說書的期待，主要在了解中國（包含臺灣）的情勢，而唐船對此也有正面回應。另一方面，荷蘭風說書最缺乏的部分則是中國大陸，荷蘭人終究未能將中國情勢的訊息傳遞給日本，這是因為荷蘭人除在某一段時期內統治臺灣外，再也沒有機會跨進中國所致。

<sup>60</sup> 《集成》，上卷，54 號，頁 123。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頁 480 中僅記錄 1684 年來廈門的荷蘭人將施琅船上的錨索破壞等事情，因此被禁止貿易，並被驅逐回國，這或許可作為比對。但是《華夷變態》中並沒有提到與葡萄牙人相關的事情。

<sup>61</sup> 荷蘭風說書，到 1685 年仍見「ダツ人」（韃人）「ダツ之頭」（韃子之頭）的稱呼。

## 引用書目

Frederik Coyet (著)、生田滋 (訳注)

1988 《閑却されたるフォルモサ》。東京：岩波書店。

小糸忠吾

1978 〈中国・西方間の交流と邸報：十八世紀末までの進展を探る〉、《ソフィア》27(3): 236-250。

山脇悌二郎

1960 《近世日中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日蘭学会法政蘭学研究会 (編)

1977 《和蘭風説書集成》、上巻。東京：吉川弘文館。

1979 《和蘭風説書集成》、下巻。東京：吉川弘文館。

木村直樹

2000 〈異国船紛争処理と幕藩制国家：1660年代の東アジア海域を中心に〉、收於藤田覚編、《十七世紀の日本と東アジア》、頁11-38。東京：山川出版社。

木津祐子

2010 〈唐通事の「官話」受容：もう一つの「訓読」〉、收於中村春作、市来津由彦、田尻祐一郎、前田勉編、《続「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頁260-291。東京：勉誠出版。

永積昭

1961 〈鄭氏攻略をめぐる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の対清交渉(1662-1664)〉、《東洋學報》44(2): 24-53。

永積洋子

1999 〈東西交易の中継地台湾の盛衰〉、收於佐藤次高、岸本美緒編、《市場の地域史》、頁326-366。東京：山川出版社。

羽田正

2007 《東インド会社とアジアの海》。東京：講談社。

李 鍊

1988 〈最古の新聞、中国「邸報」をめぐる〉、《総合ジャーナリズム研究》25(4): 78-85。

村上直次郎 (訳注)、中村孝志 (校注)

1975 《バタヴィア城日誌》、第3冊。東京：平凡社。

足立利雄、三沢玲爾

1983 〈中国報紙(新聞)史研究(Ⅱ): 邸報および小報について〉、《関西大学社会学部紀要》15(1): 187-216。

岸本美緒

1993 〈崇禎17年の江南社会と北京情報〉、收於「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編集委員会編、《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和田博徳教授古稀記念》、頁347-364。東京：汲古書院。

岩井茂樹

2007 〈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收於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頁354-390。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

1955-1968 《唐通事会所日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1 《オランダ商館長日記》。東京：東京大学。

林田芳雄

2003 《鄭氏台湾史：鄭成功三代の興亡実紀》。東京：汲古書院。

松丸道雄、池田温、斯波義信、神田信夫、濱下武志（編）

1999 《世界歴史大系：中國史4——明、清》。東京：山川出版社。

松方冬子

2007 《オランダ風説書と近世日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0 《オランダ風説書：「鎖国」日本に語られた「世界」》。東京：中央公論社。

松浦章

2009 《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出版。

法政蘭学研究会（編）

1976 《和蘭風説書集成》，上巻。東京：日蘭学会。

1979 《和蘭風説書集成》，下巻。東京：日蘭学会。

浦廉一

1958 〈華夷變態解題：唐船風説書の研究〉，收於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説，《華夷變態》，上冊，頁1-78。東京：東洋文庫。

孫文

2011 《唐船風説：文獻與歷史——《華夷變態》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

曹永和

1988 〈環シナ海域交流史における台湾と日本〉，收於箭内健次編，《鎖国日本と国際交流》，上冊，頁611-639。東京：吉川弘文館。

彭浩

2008 〈近世日本の唐人処罰：「日本之刑罰」の適用をめぐる〉，《論集きんせい》30: 1-14。

森克己

1952 〈国姓爺の台湾攻略とオランダ風説書〉，《日本歴史》48: 2-11。

鄭廣南

1993 〈福建における鄭成功及び鄭氏の貿易に関する研究の現状〉，《中国研究月報》47(6): 32-39。

黒木國泰

2005 〈17世紀・18世紀環シナ海地域システムの変容と鄭氏台湾：漂流・漂着船関係史料を中心に〉，《宮崎女子短期大学紀要》31: 57-74。

Wills, Jr., John E. 衛思韓

1974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16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and Dutch News Reports to Japan regarding the Fall of the Zheng Regime in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Matsukata Fuyuko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fall of the Zheng regime was reported to Japan through *Tosen fusetsugaki* (Chinese News Reports) and *Oranda fusetsugaki* (Dutch News Reports) from 1683 to 1685. These news reports were compiled in Japanese by the *bakufu* interpreter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s with the crews on Chinese junks and Dutch ships.

Chinese junks from various parts of China, and even from Southeast Asia, reported the details of the downfall of the Zheng family. With new information brought in by arriving junks, previous news reports were updated. There were many such examples, reflecting competition among the junks for the favor of the Nagasaki magistrates. The Zheng family had imposed strict control on the outflow of information from their capital; hence, only junks sailing directly from the Zheng capital could report about events there. Chinese News Reports sometimes had their source of information from *kaisho* or *teiho*, a kind of official Chinese newspaper.

In contrast,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vessels were the only Dutch ships allowed to call at Nagasaki. The VOC carefully relayed the same consistent information to the Japanese; hence, the news reports were never amended. This was a Dutch strategy to maintain the trust of the *bakufu*. Having no base in China, the VOC had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events in Taiwan. As a result, the Dutch news reports contained only fragmented information, and even unsubstantiated and incorrect rumors.

**Keywords:** The Zheng Regime, Ming-Qing transition, *Tosen fusetsugaki* (Chinese News Reports), *Oranda fusetsugaki* (Dutch News Reports), Chinese Interpreters, Dutch Interpreters, Nagasaki